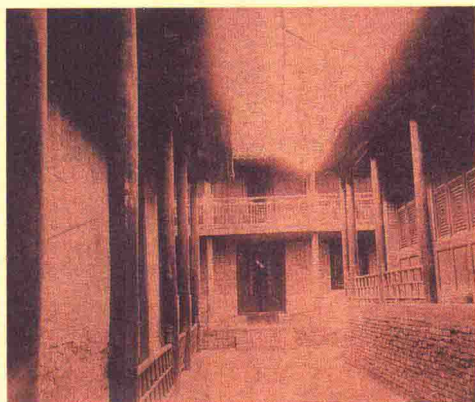


海源閣史

李
云
著



海源閣史

李
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源阁史/李云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3
ISBN 978-7-101-10760-9

I. 海… II. 李… III. 藏书楼-介绍-聊城市
IV. G259.27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3255 号

书 名 海源阁史

著 者 李 云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760-9

定 价 39.00 元

序

考察中国传统私家藏书发展历史,明清的私人藏书事业呈现出持续发展、渐趋鼎盛的态势。经济发展的繁荣,社会浓郁的文化氛围,使江浙在这一时期成为私家藏书事业的中心。直到道光年间杨以增在山东聊城建海源阁以储江南故家旧籍,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始有突破。其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湖州陆氏皕宋楼,形成四足鼎立之势,史称清末四大藏书楼,而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则又以所藏珍本丰富、存续时间长亦得“南瞿北杨”之美誉。

观海源阁之历史,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时,值汪士钟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乘便利多收汪氏递藏周锡瓚、袁廷桢、顾之逵、黄丕烈等旧藏,以粮船运载回乡,以此奠定海源阁藏书基础。之后,其子杨绍和为官京城,适逢怡府明善堂书流入市肆,遂将原属毛晋、钱谦益、季振宜、徐乾学几位藏书大户之典籍购入海源阁,使海源阁的藏书数量和品质有大幅度提升。于是海源阁就有了王绍曾先生所说的“杨氏藏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经杨绍和之子杨保彝补充谨守,海源阁藏书历经三代近百年,直到第四代阁主杨承训时期屡遭兵燹匪患散佚殆尽。

但海源阁藏书的归属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对幸运的,那些散出去的图书,经王献唐先生、周叔弢先生、傅增湘先生等诸多爱国学人们的努力,今天多为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国内公藏机构所藏,成为社会公共古文献服务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海源阁的研究向为学人所重视,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研究文章有数十篇之多。李云在随我念硕士研究生期间就对海源阁有所关注,记得当时我把曹景英、马明琴主编的《海源阁研究资料》送给他,而这本《海源阁史》则是在他论文的基础上逐步充实完善而成的。

书中详细论述了海源阁形成的背景、杨氏三代聚书的过程和特点、海源阁藏书规模及所藏珍本特征、杨氏藏书活动的具体内容,理清了海源阁藏书散佚的过程、去向和当今的归属。是一部内容翔实,且据我所知现今不多见的私家藏书楼历史个案研究著作。在审读这部书稿时我发现,李云在对某些历史细节的描写与论述时并不一味地参考现成的一些学术文章,而是以大量的书目题识内容为根据,这不仅还原了当初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纠正了一定数量的以讹传讹的不正确说法。更重要的是他在读研时我曾经和他讲过,藏书目录不单是用来查的,它是可以当学术著作来读的,看来他是记住了。他不但读了《楹书隅录》等相关的目录,而且能熟练地将里面的诸家题识文字用来作为还原与论述某些历史过程细节的依据,足见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书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李云在论述之后,还用了多幅结构图来形象地说明海源阁典籍的递藏传承关系。这让我想到了他的毕业论文《海源阁研究》,记得当时他就用了一幅递藏结构图来说明杨氏藏书的传承关系,后来这部分内容以《析海源阁藏书》为题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在我的印象里,他是第一位用这种图形的方式来表述私家藏书传承

过程的研究者。形象、直观、清晰。这次书中的递藏结构传承图更加丰富,更加细化,更加接近历史原貌。我想如果能根据明清以来私家藏书目录的记载,将重要的私家所藏逐一地用这种递藏结构传承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岂不就是一部中国私家藏书传承的图史。

李云自毕业后一直没有放松学术研究,而且目标专一,结合本职工作,以传统私家藏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发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加了由我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和《藏书·中国》丛书的撰写工作,独立完成并出版了《中国私家藏书(清代及近现代)》一书。他不但研究传统私家藏书,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对私家藏书给予充分重视。他自2011年担任北大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主任一职后,更加兢兢业业,在朱强馆长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对以近代藏书家董康诵芬室旧藏为核心的日本“大仓藏书”的收购工作,耗时两年,这批书终于在去年年底成功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是一百年来我们第一次成规模地回购留存在海外的我们自己的典籍。我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而高兴,我为母校北京大学而骄傲。

最后,我希望李云在学术上继续保持多年来勤勉坚毅的状态,在藏书史的研究上能继续有所建树,希望他能写出一部《中国私家藏书史》的专著,我答应到那时还给他写一篇《序》。

萧东发

2014年8月15日

目 录

序	萧东发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海源阁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意义与贡献	3
第二节 对藏书史及海源阁研究的状况分析	13
第二章 海源阁形成的背景分析	20
第一节 齐鲁嗜书风尚与聊城地区的藏书社会氛围	20
第二节 杨氏家世传略	26
第三节 杨以增的友朋交往	39
第三章 杨氏聚书	52
第一节 杨以增广收奠基	54
第二节 杨绍和充实完备	71
第三节 杨保彝补充谨守	80
第四章 海源阁藏善本书之递藏关系	84
第一节 明代名家之旧藏	88

2 海源阁史

第二节 清前期名家之递藏	98
第三节 清中期名家之传藏	107
第四节 海源阁藏善本典籍入藏之基本特征	124
第五章 海源阁藏书的储藏与保护	128
第一节 以海源阁为主体的杨氏藏书集合	129
第二节 海源阁藏书的保护	149
第六章 海源阁书藏规模及珍本典籍	163
第一节 海源阁书藏的大致规模	163
第二节 海源阁书藏的结构特征	180
第三节 “四经四史”之书	195
第七章 杨氏的藏书活动	210
第一节 藏书整理与成果	211
第二节 藏书对外有限利用	231
第三节 杨氏海源阁之刻书	240
第八章 海源阁藏书之散佚及去向	252
第一节 海源阁遭劫与典籍外运	253
第二节 海源阁藏书的散佚与购藏	271
第三节 海源阁遗书的归宿	291
主要参考文献	299

第一章 绪 论

“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事不昙花。”这是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里描述民国大藏书家、袁世凯第二子袁克文的一首诗。从诗的表面文字看，伦明把袁氏所藏置于中国私家藏书的发展链条中加以赞颂，他认为私家所藏是在不断变化的。记得在读书时，导师萧东发先生经常跟我们讲，研究私家藏书个体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环境下考察，因为每个私家藏书个体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文献集合的重组过程。

从宏观上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即总体上不论是藏书家数量、藏书规模、藏书品质，还是对藏书的整理使用、保护方式及刊布传播等藏书活动，都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其水平得以不断提升。但由于封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自然环境的突变以及藏书家自身的变故，给藏书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形成“书厄”，导致某一特定时期私家藏书事业发展的进程衰缓。“书厄”之后，藏书或毁或散，散者流至他处，为藏书家之间的书藏传承在客观上提供了契机，私家藏书集合呈现出此散彼聚的现象。因此，历代私家藏书发展的一

个明显特征就是,“私家藏书系统的生存机制极强,其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频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强韧性及‘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广泛可适性”。^① 因此可以讲,中国私家藏书史就是藏书集合不断重组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私人藏书家对典籍进行典藏保护、整理研究、刊布传播等一系列文化学术行为的总和。对个体私家藏书的研究可不断为私家藏书史的研究增添新的论据材料,而私家藏书史的研究成果又可以为分析个体藏书集合的聚散、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以及藏书楼的历史地位等提供宏观把握和理论指导。

观中国私家藏书史,春秋战国时期,随学术下移,百家争鸣,较为自由、开放的风气为早期的私家藏书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施惠、墨子等成为中国私人藏书家的早期代表。汉唐两代由于皇帝对私人藏书家以赐书的形式给予实质鼓励和科举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藏书活动的开展,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逐渐进入了黄金期。宋代,雕版印刷的初兴推动了私家藏书事业的持续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随着清代考据学风的盛行,藏书成为读书治学的一种必需,私家藏书事业达至鼎盛。私家藏书事业的辉煌期是私家藏书文化与个体藏书集合经过漫长的积淀与发展而形成的,这期间社会环境的变迁、统治者的提倡、取仕机制的督促、出版技术的进步、学术风气的引导等诸多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个人的藏书活动中,使得这一时期的个体私家藏书楼都独具特色,它们交相呼应,彼此映衬,共同编绘出一幅中国私家藏书文化鼎盛辉煌的秀美画卷。

对私家藏书鼎盛期的时间界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均同

^① 任继愈主编、萧东发执行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意是明清两代,但对其衰落的时间,看法不同。一种观点以为当在清末民初,由任继愈主编、萧东发执行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即持此种观点,这样,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吴兴陆氏皕宋楼和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清末四大藏书楼被认为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后辉煌的标志;而在由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中则认为在道光二十年(1860)以后,中国的私家藏书事业走向衰落,其理由是外敌入侵、农民起义等战乱造成社会动荡、经济衰败、书散楼毁,私家藏书事业已失去了它继续发展的根基。我认为后者的观点似乎有失全面。首先,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未受战乱殃及的地区,私家藏书事业仍能平稳持续发展,另外在我们为被所毁掠的典籍而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应从典籍重组的角度看到,战乱地区的藏书流散,也为其他地区的藏书家提供了扩充家藏的来源,新的藏书家也在此时出现,从私家藏书的整体上看,此间的个体数量和藏书实践活动的水平并未有所降低。其次,这一时期无论从藏书规模、藏书质量,还是从藏书楼持续的时间长度看,四大藏书楼,特别是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在中国藏书史上都是一种辉煌的标志,尤其是海源阁,它的建立更是私家藏书中心由江浙向北方转移的标志。

第一节 海源阁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意义与贡献

清末四大藏书楼成型于天下扰攘不安之际,其楼主以一家之力在一特定时期内积聚历代典籍文献,于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厥功至伟。到清光绪末年,先是陆氏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宣统

初,丁氏八千卷楼书藏又归江南图书馆。至此,尚有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作为私家藏书实体南北互映。叶德辉就此曾云:“海内藏书家,固以江南之瞿、山左之杨,为南北两大国。”^①但就当时书藏的保存状态而言,由于海源阁所藏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封闭的保存方式,其完整程度要高于铁琴铜剑楼;再加之海源阁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江南成批购进,这在交通并不发达的社会无疑创造了南书北运的一个奇迹,所以海源阁历来受到世人的关注,它在中国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居四座藏书楼之首。

海源阁藏书楼作为中国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最后辉煌时期的北方代表,不仅其藏书规模、藏书品质为以前所未有,就其聚书形成过程看,它首次大规模地把江南旧家所藏善本迁运北方,使自南宋以来所逐步形成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局面有所动摇,是我国私家藏书格局得以变更的开始。

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多重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到南宋时期才初步形成的。首先,科举取士制度的逐步完善助推了藏书风气的形成,为读书而藏书逐渐成为读书人生活中的一种需求,以后这种需求又发展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兴趣。南宋朝廷承北宋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重视科举,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途较历代更为畅通,社会各阶层读书治学气氛浓郁,购书、读书、藏书成为普遍风气。其次,随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广泛运用使典籍刊印数量激增,给私人聚书提供了保障。杨渭生在《两宋文化史研究》中说:“宋代市上印本充斥,书多而价低,给私人收藏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至宗室公卿,下至四方士民,私家藏书蔚然成风。……仅浙江湖州一地,拥书数

^① (清)叶德辉:《郇园山居文录》卷下,《郇园先生全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汇印本。

万卷的藏书家就有七八家。”^①南宋刻书业的繁盛,仅《昭明文选》的刊刻就能窥见一斑,当时在市上流通的刻本就有尤袤池州本、陈八部本、廖莹中建宁本、重修赣州州学本、广都裘氏重刊本,绍兴元年(1131)重刊六家注本、绍兴二十八年(1158)明州重修六臣注本、绍兴三年(1192)许衡补修尤袤刻本、景定三年(1262)补修尤袤刻本等。繁荣的刻书业,不但使得藏家藏书在数量上得以巨增,且让藏书家在藏书志趣的发挥,在同书不同版本的收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有专题的系统收藏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最后,“靖康之变”直接迫使江浙私家藏书中心的形成。这从某种意义上看,应得益于北宋私家藏书的南北均衡发展。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北宋时期,不仅形成了以京城开封为繁盛区的私家藏书中心,而且南方的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的私家藏书数量与规模也得到稳步增长。“靖康之变”后,由于淮河以北在伪齐与金的统治下,长江北岸和淮河之间又是宋金交战的主战场,宋代私家藏书和雕版良工几乎完全南移到长江以南,极大地促进了原本就有很好基础的江南私家藏书事业。这时江浙一带藏书家人数已远远超越了北宋的京城所在地河南。至此,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初步形成。

明代是江浙私家藏书中心地位巩固的时代。在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的第三章“明代私家藏书的历程”中对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所收明代知名藏书家 358 人按地域进行分析统计,得出江浙共计 256 家,占 71.7%,由此认为“浙江和江苏为有明一代藏书独领风骚之地”。

清前期,江浙私家藏书中心的地位不但得以持续巩固,且带动南方其他地区私家藏书事业迅猛发展,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态。日本学者岛田翰在其所著《两宋楼藏书源流考》中认为江浙藏书在清

① 杨渭生等著:《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9 页。

初发达的主要原因是继承了明末的兴盛。到乾隆和嘉庆两朝,由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和考据学的盛行推进了编纂著述等学术活动的繁荣,社会对典籍的积累与利用的需求大幅度提升,进而使清代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藏书楼的地理分布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基础上迅速向其他省份扩散。乾隆年间藏书家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鉴别》中讲,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不少藏书之家。另外,从乾隆为修《四库全书》向全国私人藏书家征集典籍的情况上也可以说明当时私家藏书地理分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爱平教授在《各省进呈书籍总数统计表》中得出,《四库全书》修书期间江苏进呈书籍 4804 种、浙江 4600 种、江西 1042 种、安徽 516 种、山东 366 种、直隶 238 种、福建 213 种、河南 113 种、陕西 103 种,百种以下则不计。该数据验证了这一时期私家藏书在地理分布上是以江浙为中心向全国各省呈辐射状扩散。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道光年间。

谭卓垣先生曾讲:“在考察清代的主要藏书楼时,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三百多年间的五百多个藏书家承继着藏书的事业,私人藏书的链条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往往彼时彼地的藏书散开了,而到此时此地又被重新聚集了起来。”^①此话形象地印证了私家藏书集合在私家藏书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特点,如果我们把海源阁放置于私家藏书发展的链条中来考察,它也只是其中的“一环”,但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它首次打破了藏书传承的地域规律。

① 谭卓垣著、徐雁译、谭华军校:《清代藏书楼发展史(1644—1911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9 页。

以江浙为代表的私家藏书中心之所以能持续维持达七百多年,这主要是因为独特的藏书传承地域关系所导致。私家藏书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家族成员间的传递,如父继祖业,子承父志,原有的藏书体系被完整地传承下来;社会成员间的传递,如友朋间的赠与,或某一书藏无法在家族成员间传递的情况下出现外散,其他藏书家闻风迭起收购,进而形成新的藏书集合。在海源阁出现之前,这种藏书集合的传递有着明显的地域范围,不论哪种形式的传递,从书藏的整体上看,都在当地或一定区域内进行重组,当然这并不排除书贾对零星书藏跨区域的长途贩运。但海源阁则首次打破这一书藏重组的区域规律,把江浙故家旧藏大宗成批地通过大运河迁移至北方。后来学者在对杨以增这一南书北运的创举惊叹之余,尚不惜笔墨评价其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意义。

刘阶平云:“故有清以来,吾国私家藏书,莫不身后即沦亡,或及身竟散出,除二三家外,莫不旋得旋失,流播辗转于江南境者,凡二百年,此吴趣之所以为‘藏书中心’也。……至道光间,聊城杨至堂得艺芸书舍之藏书,辇载东鲁,情势始为之一变。及后杨协卿又于北平得清宗室乐善堂之旧藏,将吾国南北精帙,悉荟萃于山左,为吾国清初以来藏书史上,一大转移也。”^①王献唐也中肯评价云:“清代私家藏书,初以江浙为中心,辗转流播,终不出江浙境外。迨聊城杨至堂,始得百宋一廛之精本,辇载而东,情势乃稍稍变矣。”^②

根据杨氏南书北运的史实对私家藏书发展格局的改变程度,

① 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概略与劫后之保存》,曹景英、马明琴主编:《海源阁研究资料》,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② 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曹景英、马明琴主编:《海源阁研究资料》,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结合前辈学者的客观评价,我们可以认为,海源阁的建立使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局面有所动摇,是我国私家藏书格局得以开始变更的标志。

于是有一种观点,在此应有所辨识。就是把海源阁的建立看作是冲破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标志,这多少有些夸大了海源阁在改变中国传统藏书格局的作用。

马明琴在其《论“海源阁”藏书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清晚期崛起的聊城杨氏海源阁以它独有的条件雄踞中原,其藏书‘为海内之甲观’。我国私家藏书的中心,从此由南方移到了北方,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私家藏书的传统格局。”^①宋红也认为海源阁“几乎冲破了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②马明霞说海源阁的建成“一举改变了我国藏书以江南为中心的局面,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与江南对峙的‘北杨’”。^③

首先,这种观点有悖于当时藏书楼南北分布数量的客观实际情况。仅就四大藏书楼而言,只有海源阁居长江以北的山东聊城,其他三座都位于长江以南的江浙。盖因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所藏宋元善本规模相当,故有“南瞿北杨”之说,但如果把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和皕宋楼看作是一个藏书整体的话,海源阁无论从所藏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它们抗衡。另外此时的江南虽屡遭战乱,私家藏书的社会环境基础受到重创,但历史的发展惯性使得私家藏书楼还是在此消彼兴地不断产生,虽然从个体规模和持续时

① 马明琴:《论“海源阁”藏书的历史地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100页—第103页。

② 宋红:《一门三代藏书家——记杨氏海源阁三世主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第92页—第93页。

③ 马明霞:《杨氏海源阁藏书印考略》,《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年第3期,第108页—第111页。

间上远不能与清前期相比,但南方私家藏书事业整体发展上还是优于北方的。

其次,从私家藏书史发展的整体上看,江浙私家藏书中心地位被冲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多重因素起着作用。清道光二十年(1840)后,由于江浙一带还是中国封建经济动荡最为剧烈的地区,在旧式生产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经济浸透的过程中,封建官僚及世家大户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经济来源,致使其藏书事业在经费支出、楼舍维护、藏书保护等方面全面受阻,有的书藏无力世代相传,于是典当变卖典籍成为必然,其结果就是使这一区域的藏书规模逐渐下滑。另外,清末废科举后,读书人一方面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型教育机构的兴办,又为读书人提供了更广阔的从业发展途径,但不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份,读书人的嗜书聚籍的文化传统习惯没有改变。因此,藏书家的身份与清前期相比,其种类得以增多,像官绅、实业家、学者教授等均成为近现代私人藏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科举取士基础上的江浙一带藏书文化的地缘优势也在消退。再就是清前期的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方式多为建楼而贮,盖因藏书家生活稳定所致。到了近代,社会进步显著,交通便利,藏书家南北往返收书频繁,加之由于一些地区自然经济环境的差异,也导致藏书家的迁徙。孙殿起在《伦哲如先生传略》中就讲:“家乡多潮湿,其旧藏之书尽饱蠹鱼,始悉藏书不宜,因尽置移北京。”^①而且在近代以后有多种原因造成职业的流动性较大,致使藏书家的书藏也非固守一处,他们以后南来北往愈与书亲的同时,也使私家藏书南北分布数量日渐均衡。

① 孙耀卿口述,雷梦水整理:《伦哲如先生传略》,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150页。